前言



中国雕塑艺术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历史。

从遥远的洪荒时代开始，人类在为生存所做的一切活动中,由制造工具开始,靠自己的双手,在这个地球上不断创造出惊人的壮举，而雕塑艺术也伴随着人类的活动逐步发展、成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考古学的诞生，为我们客观地认识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最初的雕塑作品是因原始人在骨、木、蚌等质料上随意刻划而产生的，但早于它的漫长的石器制作经历无疑是重要的前期准备。在石器制作过程中，偶有在现代人看来手法极其拙劣的石质象形物品出现，但即使是这样简单粗陋的东西的产生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陶器的出现给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表现形式，而铜器的发明则给艺术创作带来更为丰富的工具和对象。当然，青铜时代及其以前的雕塑还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工艺出现的，没有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

本世纪 70 年代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对于雕塑史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秦俑的出现，无疑是雕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秦代开始，雕塑作品中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实风格融合其中，形成秦汉时代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时期的许多优秀雕塑品在坚持其写实风格的基础上大胆夸张，在形似与神似的结合上臻于完美。

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的出现，给雕塑艺术带来新的重要内容。现存大批属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石窟、造像，向我们展现出外来的佛教艺术与汉民族文化的完美结合，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是以佛教艺术为发展脉络的，其它雕塑作品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

唐代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上无疑是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其雕塑艺术也日趋成熟。佛教石窟雕塑艺术达到了最高水平，其它形式的雕塑作品也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唐

代雕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但出现了众多佳作，而且每一类雕塑品均以“群”的形式出现，反映了博大的气势。

佛教雕塑艺术在唐代已登峰造极，至宋代开始逐步走向衰落，但彩塑艺术仍旧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这时的彩塑由石窟转向佛教寺院，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由于丧葬风俗的变化，属于丧葬类的雕塑品迅速减少，且过于程式化，缺乏创新。但宋代以后的工艺雕塑和建筑雕塑却得到长足的发展，各种质料的工艺品无不是艺术家发挥想象力和艺术水平的对象，其作品贴近生活。这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系统了解中国雕塑的历史，可以从一个侧面触及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

萌芽在漫长的史前



先从石器作文章

大约距今 1 万年前，中国原始社会的先民们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由依赖于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步入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农耕和畜牧业开始出现，其明显的标志便是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史前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

石器和木器的制造经历，其审美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制造工具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由只注重实用到生产出实用而且美观的工具的艰难历程，这从众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石器和骨器的形制变化就可见一斑。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制造石器主要使用锤击、砸击和碰砧三种方法，制造出的石器器型不易把握，基本上无美观可言；进入旧石器中期以后，人类对于石器原料的特性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相应采取了有效的打制方法，同时开始注重石器造型上的美感，于是出现了打制方法和器型都比较稳定的石器。这时的人们已经能够制造石雕刻器和石锥，当时雕刻的主要对象是骨、木等材质，由于受材质所限，这些骨、木雕刻品未能保存至今，使我们无从了解当时雕刻工艺的水平。而在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辽宁海城小孤山、四川资阳及宁夏水洞沟等遗址中，我们见到了当时人类制作的鱼叉、骨针、锥、刀和角铲等，这些工具采用锯、切、削、磨、钻等一系列专门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同时在一些遗址中还出土了经过稍微加工的用兽牙、贝壳、鸟类肢骨及小砾石等原料制作的装饰品，这表明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制作工具的过程中，雕刻工艺逐步提高。

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际，细石器出现，这表明人类制作工具的水平又达到了新的阶段。用细石器制成的骨石、木石等复合工具既实用又具有一定的美感，是当时的人们审美观念提高的重要物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大量涌现，与打制石器相比，磨制石器无论其重量感、锐利程度还是触手感都是比较科学的。这一时期的石器种类也明显增多，以适应其不同的用途，如适于砍伐的斧、锛、凿；适于耕种及收割的铲、镰、刀；适于加工谷物的磨盘、磨棒；纺线的纺轮；狩猎的矛、镞等。同时，复合工具大量出现，许多石器上的穿孔都是为安柄方便而做出的。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质带柄穿孔斧模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石器的特性及使用已经相当娴熟。

由于材质的限制，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上很少有装饰性的雕刻出现，但是在一些遗址中已能见到一些石质雕刻的人面造型，如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图 1)、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及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出土的人面石雕（图 2)。这





图1 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石雕人面图 2 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石雕人面

些石雕作品形体较小，而且为平面雕刻，但是可以看出雕刻者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人的面部特征。能够达到这一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飞跃。

骨质和木质的器物，由于其材质较软，因此易于在表面进行雕刻。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不少遗址中已经发现了石雕刻器，但未发现经过雕刻的骨质和木质作品。而在距今约 3 万年的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一件有刻划符号的骨片，系用野马的肱骨制成，所表现的可能是与狩猎有关的内容。

新石器时代的骨质雕刻品开始大量涌现，不少遗址出现雕有花纹的骨珠等装饰品。陕西西乡何家湾距今约 8 千年的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小型骨雕人头像（图 3），采用圆雕手法，比例匀称，形象生动，为目前发现最早的骨雕人物作品。同时，其他材质的雕刻品也不断出现，距今约 7 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雕刻工艺已达到较高水平，遗址中出土了包括凤鸟形象牙匕状器、双鸟朝阳象牙雕等精美的雕刻品，雕刻者已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动物形象和抽象图案的表现。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象牙梳和象牙雕筒也显示了



图 3　何家湾 骨雕人头像

较高的雕刻技艺。

由于木质较易腐烂，所以新石器时代木雕作品发现较少。辽宁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鸟形木雕和河姆渡遗址的木鱼，均为圆雕作品，表现了较熟练的木雕技艺。

陶器上的信息

陶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技术条件之下，是原始先民在生产和生活中不断摸索实践的结果。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地点是距今 1 万年的河北徐水县南庄头新石器时代遗址，但只发现了零星的陶片，而大量见到的陶制器皿是在距今约 8 千年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这时的陶器虽制作方法较为简单，但是可以看出达到这一水平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阶段，陶器造型已经比较合理。

研究者普遍认为，最早的陶器器型应是摹仿自然物或其他材料制作而成的见习器物。相信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这一推断会得到验证。

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造型，主要是从实用角度考虑，器类比较简单，器表多为素面，纹饰较少见。陶器的纹饰最初可能是偶然出现的，由于制作陶器时不慎将陶拍的痕迹留在上面，出于美观的考虑，制作者便有意制作出纹饰来。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已经有附加堆纹和乳凸纹。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纹饰有了较多种类，如绳纹、划纹、剔刺纹、小篦窝纹和附加堆纹等。磁山文化还开始在陶

器上施以简单的彩色装饰，与纹饰相映成趣，反映了原始人审美观念的提高。稍晚于磁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陶器器表装饰明显增多，如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彩陶器皿，彩陶纹饰包括各种几何纹、动物纹及人面纹等。由于陶器的特殊质地和制作过程，陶器上纹饰的种类也大量增多，并出现了许多水平较高的图案形象。河姆渡遗址陶钵上的刻划猪纹，形态逼真，表现了制作者高超的观察和表现力。

随着原始人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的发展，不少陶器上出现了较为抽象的装饰图案。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尊形陶器上刻划了 3 个相连的鸟、猪、鹿纹，这件器物时代距今约 6 千年，其纹饰具有深刻的内涵，是研究当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料，而且其图案巧妙严谨，是一件出色的雕刻作品。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陶壶，通体刻有纤细的蟠螭纹和禽鸟纹，线条精美，刻工精细，反映了高超的技法。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镂孔高柄豆，豆柄镂刻圆形和三角形孔，在不妨碍使用的前提下增加了视觉美感。而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上也装饰有镂孔和纤细的划纹，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除了陶器表面的刻划纹饰外，这一时期还发现了一些陶器上的堆塑图像。如青海大通后子河出土的一件马家窑文化陶瓮上浮塑一个女子的全身裸体像以及乐都柳湾的一件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壶上堆塑的阴阳人图像（图 4），虽较粗略，但却清楚地表现出人的性别特征，是性崇拜习俗的反映。

图 5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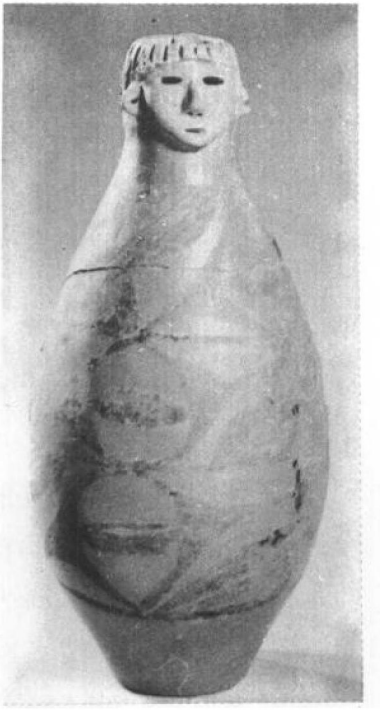


图 4　阴阳人图像彩陶壶



随着制陶工艺的进步，雕塑水平的提高，原始人已不只限于在陶器上堆塑比较简单的人体图案，一些陶器上出现了较为复杂且传神的圆形人物雕塑形象。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高度为 30 余厘米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图 5)，瓶口为一圆雕人头像，作者采用刻塑结合的方法，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一个五官端正的女子头像，头像同器身的几何纹彩绘巧妙搭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另一件出土于陕西洛南的仰韶文化人头红陶壶则表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顽童形象。此外，在甘肃秦安寺嘴遗址出土的几件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人头形器盖，使我们叹服原始先民

不但巧妙地处理了陶塑形象与器身的关系，而且配以动物花纹装饰，这种绘塑结合的手法对后来民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 6　柴家坪陶人面像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陶塑人面像。这些人面有些是单独的陶塑作品，有的则附着在陶器上，人面制作随意，但每一件都具有独到的艺术特点。甘肃天水柴家坪遗址出土的一件人面像（图 6），高达 25 厘米，虽五官比例尚不够准确，但表情刻划自然准确，配以细泥陶质，表现了一个天真的年轻女性形象；另一件出色的作品是陕西扶风姜西村出土的陶瓮口沿下的堆塑人面像，人像为倒八字眼、直鼻梁、嘴角上翘，表情生动，颇为滑稽，在夹砂粗陶质地的映衬下，向我们展示了一位饱经沧桑的男性老者形象，虽线条简单，却极为传神，堪称这一时期陶塑人面的上乘之作。这些人像发现时多为残片，陶器的完整器型不能确知，因此对于探讨这些塑像的内涵是一个缺憾。

原始人对于动物形象的表现比对人自身的表现，其手法要高明得多，彩陶上的动物纹饰及由此演化出的几何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纹饰，比起以人物为主题的纹饰来，不但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在表现手法上也可以说是更胜一筹。这种现象从动物造型的陶器的发现上可以体会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常见的汲水用的小口尖底瓶，虽然造型颇为简单，但摆在面前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会将它和鱼的样子联系起来。另一件出土于宝鸡北首岭的船形彩陶壶（图 7），巧妙地配以网纹彩绘，人们会想到这是渔猎经济的产物。

陶鬶（guī，古代陶制炊事器具，有三个空心的足），是最早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而流行于我国许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一种精美陶器，其最初的造型使人自然联想起一只昂首的大鸟(图 8)。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制陶工匠又充分发挥想象力，制造出形如吠犬、状似肥猪及介乎猪犬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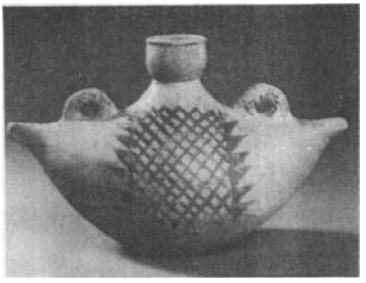


图 7 船形彩陶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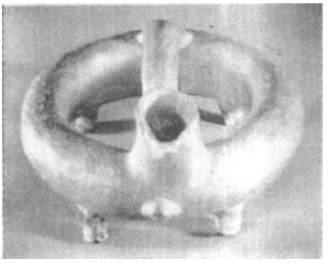


图 9 玄武提梁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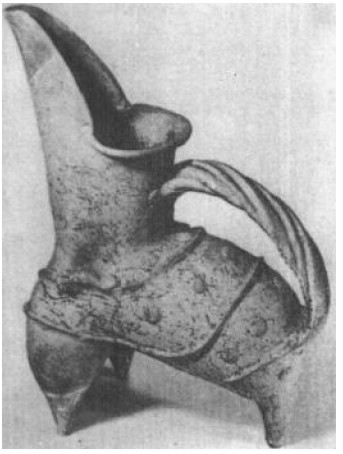


图 8 陶鬶

型之间的动物形陶鬶，且注水口和流水口的设计非常巧妙，实用性很强，又不失为精美的艺术杰作。出土于陕西华县太平庄的黑陶鹰鼎，造型别致，其尖喙（huì）、圆目、丰满的胸脯及健壮的足爪，俨然一只凶猛的黑鹰。而江苏吴江梅堰遗址的海豚形陶壶和坯县大墩子遗址的卷贝形陶壶，巧妙地利用动物形体的某些部位，收到了纯动物造型陶器达不到的艺术效果。不仅如此，一些陶器造型还蕴含了更深刻的含义，如大汶口文化的玄武提梁壶（图 9），在其巧妙的造型背后，显然又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它的造型，对于后世“四神”观念由来的研究，无疑有很大启发。

由纯粹的动物造型，发展到抽象的动物形象，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表明原始人在审美意识及抽象思维上的进步。许多陶器，其本身并看不到动物造型的影子，但由于某些部位的巧妙设计及适度夸张，引导我们产生广泛的联想。如马家窑文化的偏口彩陶壶和良渚文化的带流黑陶杯便是典型的例子。



图 10　人形彩陶罐

以人体造型为特征的陶器也有发现。1988 年，在甘肃省玉门青泉火烧沟墓地发现的一件人形彩陶罐（图 10），虽高度

仅 20 厘米，却刻划了一个生动的立人造型，其细长的眉毛、圆圆的眼睛、宽扁的鼻子及大大的嘴巴，形象颇为风趣，而粗壮的双腿和特大号的翘头靴，既显滑稽，又兼顾了陶器造型的稳固，外鼓的双臂巧妙地形成两个扳耳，整件器物造型独特，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各地发现的这些陶器雕塑作品不是偶然的，除了体现原始人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外，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原始宗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比起目前发现的几万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来，这些雕塑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也充分表明它们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的珍贵以及包含的深刻寓意，这对于探讨当时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有很大帮助。许多雕塑品出土于墓葬之中，这对于研究墓主人的身分和社会地位也有很大帮助。

石家河的动物园

在新石器时代，伴随着大量陶质器皿的发现，我们见到了许多陶塑艺术品。对于陶塑品出现的最早时间，国外有学者认为是在距今大约两万五千年前，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用陶土烧造小型塑像，但当时还没有开始制造器皿。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原始先民们或许就是因为从被火烧过的泥土中发现类似人物或动物的造型，从而受到启发，开始有目的地烧造一些小型的陶塑作品，但是这种推测还需要考古发现来验证。

目前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陶塑作品几乎是与陶质器

皿一同发现的，最早是一些动物题材的作品，如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塑羊头和猪头，这与原始人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许多遗址的动物陶塑仅为零星的发现，数量较少，且种类单调，早期的动物造型也比较粗糙。而比较成功的动物陶塑作品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发现的。

石家河，位于江汉平原上的湖北省天门市境内，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几十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5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考古调查时，在几处遗址上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陶塑动物作品,种类有狗、羊、鸭、鹅、鸟、龟、鱼等,虽然都是些小型陶塑品,但是各类动物形态逼真，显示了高超的表现手法，调查者初步将这些陶塑的时代定为汉代。从 70 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陆续在石家河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又出土了许多动物陶塑，根据地层关系，专家们发现这些陶塑的时代大大早于原先的估计，而应属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1987年,石家河考古队在该遗址群中的邓家湾遗址进行发掘时，从两个直径均不足两米的灰坑中出土陶塑品数千件，如此众多的动物雕塑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宛如置身于一个原始时代的动物园中。

石家河出土的动物陶塑均为捏塑而成，以家畜和家禽为主，多为小型动物。狗是陶塑中最有特色的动物造型之一，且数量相当多，姿态各异，常见的是立式，观其形态，有的静立，有的奔走，有的狂吠；有的抬头翘尾，身体稍向前倾，注视前方，似准备随时扑击；有的狗背上还驮有一幼犬，或立一小鸟，二者怡然相处，颇有情趣。卧犬一般作侧

卧状，四肢自然交合，腰身略蜷，颈部粗长，头部向上扬起，似在警惕地张望和谛听，造型生动传神。羊也是较有特色的陶塑，从形态观察，有绵羊和山羊两类，绵羊数量较少，作奔跑状，身体肥大，角向前弯曲，双目有神，短尾；山羊发现数量很多，身体较瘦小，头部所占比例较大，羊角围绕耳朵卷曲一周。陶猪皆作站立的姿势，腰圆体肥，神态愚憨，吻部较大，吻端可见两个圆形鼻孔，小耳朵，四肢短粗，短尾。兔的数量较少，其身体略弓，头上竖两长耳，四腿和尾较短小。

家禽中，鸡的数量极多，一般高 6—9 厘米，皆为站立姿势，特征是短喙粗颈，胸腹部位特别肥厚，双翅似因退化而变得十分弱小，尾羽一般短而齐，尾下端附一支点，和双腿共同保持身体的平衡。陶鸡还可看出有雌雄之分：雄鸡有高大的鸡冠，雌鸡则没有。少数鸡的眼睛用小泥窝贴附，极为传神。鸟的数量很多。有长尾、短尾两类。长尾鸟一般长 6—7 厘米，其头颈抬起，双翅发达，尾羽很长，尾端大多有分叉，如燕尾状；短尾鸟长仅 4 厘米左右，与长尾鸟的主要区别是尾巴较短小。此外还有一些鸟塑作品为两只鸟背向而立，尾部相连。陶鸭的数量发现极少，主要特征为长颈、扁喙。水生动物主要有鳖和鱼类，陶鳖出土很多，神态多有细微变化，主要特征为长颈、双眼圆鼓，伸出四肢作爬行状。鱼类一般为扁梭形，背腹部有鳍，头部两侧有小而突出的双眼。这里还发现有个别水牛陶塑，但过于残碎，此外不见其它大型家畜形象。

在家畜家禽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动物造型，主要为象、

猴、猫头鹰等。象的出土数量较多，均身躯肥大，憨态可掬，分为雌雄两类，雄象均有獠牙，而雌象无獠牙，长鼻前伸卷屈。还有一种类似象的动物，鼻子向前突出，但较象鼻短，且不弯曲，小耳，短尾直伸，作奔跑冲斗之态，有的学者认为此种不是象，应是貘。这里出土的数只陶猴形态逼真，头较小而圆，四肢发达，前肢抱一圆形物品在啃食，以后腿和尾支撑而坐。出土的陶塑猫头鹰数量较少，特征是头部圆大，圆眼尖喙，小尾。另外还有一种企鹅形鸟，尖喙，眼睛鼓出，有短尾，呈坐姿。

除动物造型外，这里还发现了一批陶塑人像，个体也较小，姿势有跪坐和盘腿坐两种。跪坐陶人发现较多，形态特征基本相同，一般高 10 厘米左右，头戴浅圆帽，身穿长袍，细腰身，衣袖较宽。陶人耳鼻刻划清晰，颈部修长，两手置于身前横抱一条大鱼，神态庄重，似在呈供。盘腿而坐的陶人姿态与前者相同，在臀部有一个附加的支点（图 11）。这些人物虽个体较小，但其形态却与长江流域汉代所见庖厨俑有些近似之处，所以也难怪最初这些陶塑被误定为汉代之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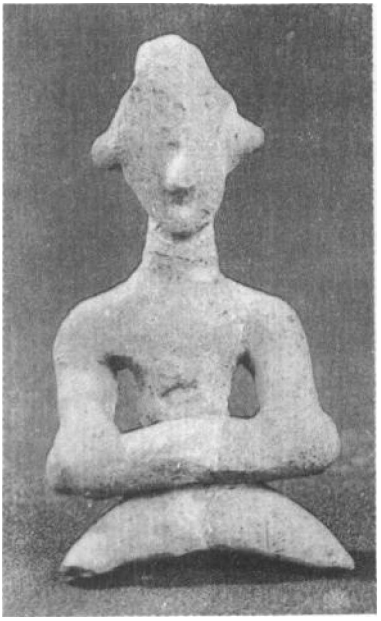


图 11　石家河陶人像

在以往新石器时代遗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